

他勤奋好学,数百人报考外交部,是唯一胜出的
他工作出色,为抗日募捐1200万菲币,送到国内

外交部“活字典”姚竹修 为抗日奔走,直到生命最后一页

抗日外交九烈士中,姚竹修是唯一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——因为家贫,他考上了大学但没能上成。他去了上海美孚洋行当英文打字员,因为勤奋好学,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招考,上海数百人应考,27岁的他成为唯一一名被录取者。从新加坡到马尼拉,姚竹修的主要工作就是抗日募捐。70年前,姚竹修被日军从领事馆抓走时,他的女儿姚敏华只有5岁,但她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

现代快报记者 常毅 胡玉梅 王颖菲 贾磊 摄影 赵杰 实习生 马晶晶



杨锡珍带着子女来到姚竹修墓前祭奠



1941年,姚竹修与夫人杨锡珍、女儿姚舜华在马尼拉的合影

没能上大学,是他一生的遗憾

“我父亲很好学,生下两个孩子后,还天天看书到深夜,冷了就随手扯过妈妈的旗袍披身上,连上厕所都捧着书。”回忆起父亲姚竹修时,姚敏华、姚舜华姐妹都难以忘记儿时家里这最常见的一幕。

姚竹修出生在苏州阊门外小木梳巷,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在苏州桃花坞高中没有读完,就不得不辍学,那是1924年。30年后,他的大女儿姚敏华考上华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时,面对家里的困境,一度想弃学工作,母亲杨锡珍说:“你爸爸当年就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没能上大学,导致遗憾终生。你爸爸在世时经常谈起,一定要你们四个受到良好的教育。”

辍学后的姚竹修跟随家人到上海谋生,父亲在太平洋保险公司失业后,到黄浦江码头加油站工作。18岁的姚竹修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水平,报名参加大学,结果考取了杭州之江大学,但仍由于经济拮据而未能深造。

后来,美孚洋行招工,姚竹修应聘做英文打字员,还兼任纱布交易所记账员。“洋行里很多外国人,讲话用英语,所以我父亲英文特别好。”姚敏华说。

姚竹修的大学梦在几年后勉强得以实现,在江苏交涉公署当科员时,他到“万国函授大学”就读。24岁时,他娶了杨锡珍。

姚竹修进入外交界的过程,让他的子女在70多年后,仍感自豪。“那是1933年7月,国民政府外交部招考,我父亲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,就报了名。”姚竹修的二女儿姚舜华说,当时竞争的激烈,如同如今报考公务员,上海有好几百人报考。

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外语和外交知识。姚竹修在洋行的工作经历优势体现了出来,他又夜以继日,学习外交知识,加上自己的悟性,考试中,他和另外两人得以进入复试,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考试。

这一次,只留下了他一人,进入外交部欧美司,后在情报司任科员。

杨锡珍跟着丈夫来到南京,他们一家住在鼓楼黄泥岗88号,在这里住了三年。这期间,这位好学的外交部科员继续勤苦读书,翻译出版了《国家责任》,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这是美国国际法学家依格顿的著作。

被日军带走时,女儿吓得哇哇大叫

在1939年8月赴马尼拉前,姚竹修先后到土耳其和新加坡任职。1937年抗战爆发后,姚竹修在驻新加坡总领事馆的主要工作,就是从事抗日募捐等工作。他的工作如此出色,以至于从1935年出任土耳其时的委任一级,仅仅四年后,就升任到九级。“外交部的人都喊他‘活字典’,遇到弄不清的问题都会想到找他。”姚舜华说,这要归功于父亲通晓英语国家的风土人情,以及对外交条文的熟悉。

从新加坡调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馆随员领事后,姚竹修的工作除了抗日募捐外,还要部署太平洋战争华侨应急活动。他和同事们一起,募捐了1200万菲币,送到国内。

和姚竹修一起到马尼拉的,是他的妻子杨锡珍和二女儿姚舜华。出国前,杨锡珍刚生下小儿子姚铮华。没想到,姚竹修连这个小儿子的面都没有见到,就牺牲了。

姚竹修一家住在总领事馆,很多外交官的家眷也住在这里,他们的夫人彼此之间称“太太”。“我记得有位阿姨,非常年轻漂亮,经常弹钢琴唱歌,唱得可好听了。”姚舜华很久以后才知道,这位会弹钢琴会唱歌的阿姨,是王恭玮的新婚妻子。王恭玮和姚朱修等人一起被害时,结婚才两个月。

姚竹修被抓时,姚舜华只有5岁,但她依然记得那天的情景。“我们一家都住在领事馆里,日本兵闯进来时,我吓得哇哇大叫,但不敢大哭。妈妈抱住我,把我的头搂在她胸前。我们无力反抗,只能

眼睁睁看着我爸爸被带走。”

丈夫们被日军抓走了,太太们带着孩子集中在一个领事馆外的一个大房子里。姚舜华记得,这个房子很大,中间有个大客厅,四周有很多房间,大家挤在一起住。她和妈妈与带着两个孩子的萧太太住其中一个房间。萧太太的丈夫是萧东明,也是九烈士之一。

看妈妈总穿黑旗袍,才知道父亲不在了

8位外交官刚被抓时,还允许家属探视。杨锡珍每天烧好饭菜给丈夫送去,姚舜华也跟着去了一次。“那时我不太懂事,就听见爸爸说,如果出了事,就去找谁谁谁,那是他的好朋友。后来才知道,他是在跟妈妈交代后事。那时他已经预料到自己可能再出不来了。”

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,外交官的家眷们一直住在这个大房子里,大家没有收入,只能靠变卖物品度日。好在大家都相互照应,华侨们也经常接济,才渡过难关。“在那里,中国领事馆就是华侨的主心骨,外交官被抓,华侨们自然会照顾我们。”

60多年后,姚舜华进电影院看《金陵十三钗》,那段岁月再度回到眼前。“日军来轰炸,我不懂,看着天上飞机扔下很多‘酱油瓶’,落到地上就炸了。妈妈惊恐地说,这是炸弹,得躲。”

但妈妈有一次差点没躲过炸弹,“那天,妈妈伸头往窗外看,头刚缩回来,一块弹片嗖地飞过来,就是妈妈刚才那个位置。”姚舜华后来很后怕,“如果妈妈也不在了,我就成了孤儿了,在异国他乡,谁来管我……”电话那头,她的声音呜咽了。

那几年,每到夜幕降临,马尼拉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。静夜中,姚舜华经常老远听见“啊——啊——”的惨叫,还有枪声。太太们说,那是日本人在杀华侨。惨叫和炸弹声音,现在还在她的耳边回响。再看电影时,如身临其境。“那

时,父亲还不知下落,我心里已经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种子。”

姚舜华一直以为,父亲还被日本人关着。但不知道从哪天开始,她发现妈妈神情不对,“中国外交官的太太们都是穿旗袍的,那时开始,我妈妈总是穿黑旗袍。我就问妈妈,为什么老穿这一件。妈妈一把搂住我,大哭着说,你爸爸不在了。”

外婆带着孩子艰难度日

1946年,姚舜华跟妈妈回国时,已经9岁了。“很多外交官的太太都出国了,但妈妈还有三个孩子在,我们不能不回来。”

在国内的,是长子建华,大女儿敏华,和幼子铮华。姚竹修带着妻女出国后,三个孩子就由外婆带。抗战爆发后,他们和姚竹修失去联系,为避战乱,躲到苏州乡下。

“我那时没有了外公,外婆是个小脚老太太,带着我们三个,住到亲戚家腾出的一个房子里。”姚敏华说,那时她还不到10岁。家里没有收入,大哥就去了江苏昆山一家桐油行当学徒。自己则到一个亲戚家当小保姆,干杂活,洗尿布。弟弟太小,只能跟着外婆。后来她受不了苦,跑回外婆身边,拾柴、挖野菜。好在外婆的妹妹家境较好,时不时从上海寄一两百元钱来,可供勉强度日。

不过,两个孩子还是经常饿肚子,姚敏华经常带着弟弟吃“百家饭”,“就是到不同的亲戚家吃饭,一吃一个月,有的亲戚很远的,像姨夫的堂妹的婆家,舅舅的对象家,那时还没有结婚,我们也去吃了一个月。”从1942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,老太太带着两个孩子,在乡下呆了三年。

直到有一天,老太太接到上海亲戚的通知:女儿要从菲律宾回来了。抗战胜利后,杨锡珍先联系到在上海的堂兄,才终于打听到母亲和三个孩子的下落。老太太小脚走不了远路,去上海接杨锡珍的,是12岁的姚敏华。

“妈妈和妹妹是乘船来的,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穿的什么衣服。”1946年的那一天,客轮缓缓靠近上海码头,姚敏华站在人群中,一眼就认出了船舷后的妈妈,穿着咖啡色的西装,一看到码头上的女儿和亲人,就开始抹眼泪。

下船后,杨锡珍母女跟着人流走出来,姚敏华跑过去接她。“妈妈一路哭着跑过来的,一把抱住我就大哭起来。”

几十年后故人相见,潸然泪下

但父亲牺牲的事,她是后来才慢慢听妈妈提起的。

丈夫去世时,杨锡珍才31岁。她没有改嫁,靠丈夫生前的积蓄,在苏州买了房子,把母亲和孩子们都接了回来,让女儿都去重新上学。她还让她的弟弟妹妹都住到房子里,感谢他们照顾孩子。

杨锡珍没有工作,抚养孩子生活、读书,全靠变卖家产,后来不得不借债度日。这位只读过私塾的女性,遵照丈夫生前的遗愿,让孩子们都读书、上大学。“那时,女孩子读到小学就不错了,但我们姐妹都读出来了。”姚敏华说,她上的是师范大学,妹妹上的中专,这样选择是因为可以公费。她上大学的那年,杨锡珍卖掉一半房产,还了债。

2011年3月2日,杨锡珍去世。

70年过去,姚建华也已去世,姚家姐妹因为当时年幼,已经记不清父亲的模样。“听妈妈说,父亲一米七样子,很温和,说话很轻,也从不骂孩子。他是外交官,注重外表,谈吐得当,还教我妈妈读书和礼仪。”

姚家子女曾多次来南京菊花台拜祭父亲。有一次,姚舜华遇到了杨光泐烈士的长女杨蕾蕾,两个当年同时失去父亲的小女孩,如今都已白发苍苍的老人。这个大她几岁的姐姐说:“妹妹,你还记得吗?在马尼拉,我还教你唱英文歌呢!”回顾那段烽火岁月,两人不禁潸然泪下。